

两会声音

部分药价超预期下跌90%，代表呼吁药企理性应对药品带量采购政策——

别让“拼多多”断了药企创新路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某一药品价格突然悬崖式下跌90%，这种情况不是很符合市场规律。”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谈到近期部分药品采购价的断崖式下跌时，表示其中不排除企业竞标时，为了眼前利益，可能有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做法。

此前，4个直辖市及7个省会城市实施集中带量采购试点(以下简称“带量采购”)，以价换量、价低者得，中标企业将获得70%左右的市场份额。为此，最终披露报价出人意料，与2017年最低采购价相比，同品种药品价格平均降幅为52%，降幅最高超过90%。

药品采购价大幅下跌是不是件好事?与百姓用药的价格将有怎样的关联?医药界代表给出不同的解读。

降价90%，出人意料

有些企业能够降价90%，出乎意料。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医药集团董事长耿福能表示，这一现象存在两种可能：如果降价降的是企业的利润，确实有90%以上的利润，说明

药品市场存在价格泡沫、价格虚高，企业此前获得暴利，但如果为了市场份额，宁愿亏损相当长的时间，则是“倾销”，这是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以中标的阿托伐他汀片为例，该药品此前7元/片，而此次拟中选的采购价才0.94元/片。耿福能说：“医药行业到底有多大的利润，就像‘脚在自己的鞋子里’(业内人知道深浅，但外行并不知晓)。”而这次招标价透明的带量采购，在一定程度上意外地试出了医药行业的水分。

非理性降价，国产创新药研发“难以为继”

“我们的伊瑞可是国产吉非替尼片，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在我们的产品没有上市前，进口吉非替尼在国内的价格是5000元一盒。然而，在带量采购的竞标中，我们没有入选。”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说，“尽管我们报的价格，比我们的定价低了很多，但是进口药价超出预期地跳水了。”资料显示，入选的进口药价格为547元每盒。

“利润受到冲击、对保持研发的持续投入

特别是对于国内企业刚刚起步的创新药的研发造成了压力。”李燕说，正是国产药成功研发上市，促成了天价进口药的大幅降价，国内药企需要通过创新为百姓、为中国自己的医药产业作出贡献。

而当企业的正当利润受到不当竞争的挤压时，创新药研发的持续和坚守，将成为企业需要面对的另一挑战。

“如果销售价格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药企拿什么钱支持它的创新发展，或者支持它从仿制药向创新药的转向?”胡季强感到忧心。

理性对待试点政策，维护产业可持续发展

3月20日，上海、沈阳、大连将开始实施药品带量采购试点政策，企业将以中标价格提供相应25类药品，公众也将以中标价格买到这些药品。

“这些药品中的大部分是医保药品，对于有医保的人感受可能不会太大。”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表示，非医保患者的感受应该会很明显。

然而，更长远的药品市场走势或许对百

姓的“钱袋子”影响更大。胡季强分析，如果企业为了中标给出的价格不合理导致入不敷出，将出现不可持续的情况，例如供应不上，而未中标企业很可能由于没有市场，停止生产此类药品，则会出现由于生产企业单一造成的药品短缺现象。

事实上，近期药品市场存在着“降价90%”和“涨价300%”并存的现象。有分析认为，后者是由于原料药生产企业过分集中。相关信息显示，我国共有约1500种原料药，其中50种原料药只有1家企业取得审批资格可以生产，44种原料药只有2家企业可以生产，40种原料药只有3家企业可以生产。

接受采访的多位医药界代表表示，一个降低药价、还利于民的好政策，在部分企业非理性的价格比拼中“误伤”制药生产企业的创新动力，甚至可能导致因生产企业的单一而引发的后续涨价，最终将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为此，医药界代表建议：企业应理性对待试点政策。同时，对一些非试点地区“尽快联动实行该政策”的呼声应审慎对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开展进一步工作。

近三年科学卫星发射数量为零，吴季委员呼吁——空间科学研究亟须更多「空间」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当前，通过粒子加速器、大孔径天文望远镜、科学实验卫星等大型科学装置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式，已成为实现基础科学前沿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布局却相对滞后。因此，建议尽快成立空间科学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从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实施深刻的改革。”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说。

吴季介绍，基础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由科学家兴趣驱动；另一类则是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二战以后，这类定向的基础研究逐渐成为实现重大前沿突破的主流模式。科学卫星就属于此类，其瞄准自然科学宏观和微观两大前沿的研究手段，通过发射卫星获取在地面上无法获取的科学观测和实验数据。

有数据显示，1950年以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中，只有一项是和大型科学装置有关的。而在1970年后，超过40%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利用大科学装置或科学卫星的数据完成的，1990年后这个比例高达48%。

前几年，“悟空号”“墨子号”等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备受民众关注。“然而，近3年，我国科学卫星的发射数量几乎为0。按照目前布局，到2021年，才会有科学卫星发射。”吴季说。

吴季表示，科学卫星任务的优先权很低，从2002年到2011年之间连续10年都没有科学卫星立项。目前我国的科学卫星系列只有中国科学院在专项中实施，目前还没有国家专项支持。

“卫星研制周期需要4—5年，因此，从现在到2021年将没有科学卫星上天。2022年之后是否有空间科学专项也不得而知。由于一个科学卫星计划需要花费数十亿人民币，甚至更多，放在中科院专项中体量也显得过大。”吴季说，尽管如此，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里的投入的绝对值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仅NASA一个部门每年的预算就近200亿美元，其中有约1/3用于科学卫星。而中科院空间科学专项在“十二五”计划5年中，只用了30亿元。

吴季认为，未来20—30年中，空间科技领域将会步入快速发展期。选择空间科学建立国家实验室，可以为我们摆脱亦步亦趋、跟踪和效仿别人，树立自己独特的目

标提供广阔空间。

吴季建议，选择在空间科学领域设立国家实验室，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做好筹划。新的空间科学国家实验室，必须考虑将中国航天技术力量统筹起来。同时，要将政府稳定投入和活跃的民间投入相结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玉兔二号在月亮上看石头 专家解释其中奥秘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唐婷 付毅飞)来自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官微的最新消息称，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唤醒后工作正常。巡视器已于3月3日18时25分进入月午。预计3月10日9时出月午，3月13日10时进行月夜休眠设置。

据悉，第三月昼期间，巡视器对石块、车辙进行了科学探测。探测的月球最大直径约20厘米，探测时月球车距离石块约1.2米。目前月球车已累计行走约127米。

巡视器对石块、车辙进行科学探测的意义有哪些?中科院空间中心专家介绍，在人类此前没有近距离探测过的月背表面环境中发现了石块，可以开展许多科学研究。比如，弄清石块的来源，它们到底是月球上的“土著”，还是外来的陨石。如果是月球本土的怎样，那么石块形成的物理过程又是怎样的。当然，石块探测的科学意义，还需要地质

专家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加以详细解读。

同样，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勃松也分析指出，月背表面的石块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撞击溅射体，或者来自月球本地，具有与月尘不同的原初特性和地质活动信息。而车辙的深浅表征了月尘部分物理特性，翻出的浅层月尘可能提供长达数十亿年的月球表面演化的相关信息。

中科院空间中心专家指出，不要小看从月背传回的石块图片，事实上拍摄过程并不容易。巡视器的移动并不像人那么自如，为了找到好的拍摄角度，要反复进行移动和调整。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完成工程既定目标后，已经转入科学探测阶段。中科院空间中心专家认为，巡视器对石块、车辙进行科学探测还只是个开始。未来将以科学家的需求为主导开展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相信会有更多更有趣的发现。

长征五号火箭2019年将复飞 未来两年将执行多项重要任务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付毅飞)记者4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悉，2019年长征五号火箭将重返航天发射舞台，执行2017年7月发射任务失利后的复飞任务。

2017年7月2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洪介绍，自长征五号遥二任务飞行失利后，火箭研制队伍通过围绕全箭的设计方案和制造工艺深入开展了再分析、再设计和再验证工作，反思不足，全面审视在设计、产品以及过程控制等方面的工作有效性。

截至目前，全箭各系统均已完成复查分析工作，针对发现的薄弱环节采取了相关改进措施，明确了具体更改方案，正在进行产品更改后的试验验证。

李洪说，目前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已整

装待发，预计在2019年下半年，执行发射高轨大吨位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以验证故障归零及改进措施的有效性。

据了解，此次复飞任务将发射基于东方红五号卫星公用平台研制的新技术试验卫星——实践20号。该卫星代表着我国高轨大型卫星平台的最高水平，其将对东五平台的“高承载多适应桁架结构”“大功率配电”等八大关键技术进行在轨飞行验证，推动并牵引以下一代高容量通信卫星为代表的相关型号立项研制工作。

李洪还透露，完成通三飞行试验后，长征五号火箭将在2019年至2020年，先后执行多个重要发射任务，支撑我国探月三期、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的稳步实施。“当然，前提是通三任务复飞前要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在可靠性、安全性方面加倍努力。”他说。

科技大咖 踊跃发言

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各地驻地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图为科技界别政协委员潘建伟(左)、科技界别政协委员曹健林(中)、科技界别政协委员袁亚湘(右)进行小组发言。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两会声音

何建华委员：要给基础研究“十年磨一剑”的机会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现在重大问题很多，但大家不敢去碰。申请课题时，更愿意去找热点，因为热度高的领域，更容易发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生命科学研究部主任何建华4日感慨，科研不能跟着热点跑，但为考核评价指挥棒所累，科研人员不敢或者不能去爬那更高的山峰。

何建华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研究问题做了几年，文章发表情况不是太好，科研人员自己还坚持，但是“有意愿、没条件”。现行评价体系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对

机构，都重论文数量与文章影响因子等定量考核指标，而且考核频繁、周期短。“恨不得一年就出成果。”何建华说，“大家都想着要‘快’，谁快，谁就能得到更多支持，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这就是‘快鱼吃慢鱼’。要是好几年不出成果，科研人员就没了经费，课题不得不停下，在机构里甚至还可能被末位淘汰。”

“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是：研究队伍庞大、经费投入不少、论文发表很多，但重大原始创新很少。”何建华说，真正的原始创新研究，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探索研究，鲜有人愿意回津、敢于回津，也难以得到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部门的持续支持。科研人员、科研机构

和科研管理部门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追求数量与追求速度的迷思中，“我国整个基础研究体系还处于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之中”。

基础研究要走到前沿，需要一批队伍攀登科学险峰，而这批队伍，也需要稳定的补给来“保驾护航”。何建华说，宏观政策应该进行调整，营造能使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敢于“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氛围。

具体怎么做?何建华认为，可以对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科研人员(比如副高级以上)给予稳定的基本支持，给予适当的待遇和研究经费，允许自主选题开

展研究。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应以中长期考核评价为主，鼓励科研机构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为目标，自主部署研究方向、组织研究团队。“基础研究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过度竞争不利于潜心研究。”

坚持之后，如果真的取得重大成果，就该对这样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给予重奖。何建华强调，一般性论文成果仅作参考或不作参考。对于拥有各类人才数量和承担课题的数量也仅作参考，这些只是取得原始创新成果的先决条件，而非成果本身。“至于什么是重大原始创新，也需要学术界逐渐形成共识。”(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杨卫委员：期刊联盟可否扭转“西强东弱”局面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何星辉)中国对世界学术贡献率超过20%，但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却不到2%。4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表示，中国期刊在质量上，与国际上知名期刊的鸿沟正在扩大，期刊市场“西强东弱”的局面，亟待在国家层面上加以解决。

杨卫表示，在国际期刊市场上，单打独斗早就不行了，但国内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是研究机构或高校主办，单就实力和运营方面，根本没法和国际化的期刊巨头相提并论。期刊集团的扩张和期刊平台的拓展，拉大了期刊市场的东西方鸿沟，特别是期刊的数字化、让审稿、发稿更为便捷。一些巨型期刊覆盖所有学科，论文容量巨大不说，还涵盖数据库等功能。杨卫说，他将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层面加以统筹推进，以期联盟的方式，打造国内大型期刊平台。

航天人“跨界”提出教育议案

马杰代表：建设质量强国需要一部《质量教育法》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党委书记马杰带来了关于制定《质量教育法》的议案。作为一名航天人，她怎么“跨界”关心起教育?

马杰对质量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航天品质已经成为高质量、高可靠性的代名词。”她说，“质量文化、质量理念、质量意识、质量方法和技术工具的原始创新和再创新，贯穿整个我国航天事业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一以贯之的质量教育促使历代航天人视质量为政治、视质量为生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质量强国的目标。在马杰看来，质量强国建设是我国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更是从“大国”到“强国”的根本之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建设科技强

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都需要依靠“硬质量”和“软质量”双提升的方式，齐头并进实现中国速度、中国质量。

对此，质量教育至关重要。马杰表示，如今人们对高质量追求越来越强烈，产品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人民的幸福感。质量教育有助于增加全民的质量参与度，促进质量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质量公平感。同时，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质量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深入开展质量科学研究，不断加强质量教育，才能更好地支撑质量强国建设。

但她认为，我国在质量教育方面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我国尚无一部统一、完善的法律来规范质量教育，质量教育的不系统性也导致了中庸思想和本源性质思维获得市场，一些企业

没有把质量当作生命，更看重市场的投机性。”马杰说，不仅企业自身对于质量管理的基础和支撑。她认为，在公共基础教育体系中增加质量教育的内容，有助于培育国民的质量素养和质量意识；通过普及和加强质量教育，有助于发扬“企业家精神”“大国工匠”精神。

针对这些问题，马杰表示，研究制定一部《质量教育法》，将成为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她认为，在公共基础教育体系中增加质量教育的内容，有助于培育国民的质量素养和质量意识；通过普及和加强质量教育，有助于发扬“企业家精神”“大国工匠”精神。

同时她建议，构建科学有效的质量教育工作体系，明确政府、高校和社会对促进质量教育的基本职责，以及履行职责的行为模式。此外，建立科学的共治关系、有效的共治机制，可以为质量教育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